

16.13



第二辑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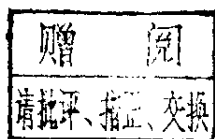
浙川
縣
文
史
資
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浙川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七月出版

封面设计：靳富有

责任校对：范自杰 刘国瑞

新川县印刷厂

印 制

印数 0—3 000 本

1987年7月

目 录

一、黄正夏同志对浙川宋湾农民暴动 情况的回忆

.....黄正夏（1）

二、宋湾农民暴动

.....田永潮 张恒耀 周振华（11）

三、宋湾农民暴动被害英烈简介

.....党史办、民政局供稿（20）

胡邦藩烈士牺牲前后.....（20）

马士彦.....（22）

马青彦.....（23）

张玉杰.....（23）

姚秉廉.....（26）

四、宋藩舟事略

.....党史办供稿、张恒耀整理（27）

五、吴怀三

.....张恒耀(34)

六、黄从书传略

.....阎振华 全景亮(43)

七、开封女中在浙川时的学生运动

.....程致光(51)

八、回忆开封师范迁浙川后的活动情况

.....张汉杰讲述 张恒耀整理(60)

九、往事的回忆(节选)

.....田向前(77)

十、浙川蒙古族的来源暨变迁初考

.....马瑞华(86)

十一、鲍汝澧和他的京剧团

.....曹荣泽口述、刘文兵整理(89)

十二、浙川县矿藏资源与开发情况

.....郭志高(92)

十三、袁宝德与吴清典

.....王又曾口述 王本庆整理(96)

十四、建国前浙川工业简况

.....王章成 (100)



清光绪六年浙川知县沈麟元
简述

.....浙川县档案馆赵磊供稿 (103)

黄正夏同志对浙川宋湾 农民暴动情况的回忆

黄 正 夏

(一)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日本鬼子把战火烧到了华北广大地区。蒋介石已逃到了四川，李宗仁由武汉撤退到鄂西北重镇老河口，并在此地设立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李宗仁和蒋介石有矛盾，一度表现较为开明，愿意同共产党合作。我们也尽量利用合法名义，发展人民抗日运动。此时有大批革命志士、革命青年，云集到襄樊、老河口和均县草店等几个中心点。于是，各式各样的人民团体，先后组织起来。利用各种名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我是襄樊人。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我到达均县草店被分配在军民文化工作站工作。这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后又被分配在石板滩文化工作站任主任。在鄂西北特委统一领导与部署下，各种抗日团体，都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活动。同时，也积极从事地下党的建设，真是热火朝天，生气勃勃。但是，武汉沦陷以后，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首先是在一九三八年冬季，解散了

“民先”、“青救”、“蚁社”等进步团体。一九三九年春、夏，蒋介石就积极准备发动反共高潮。抛出了《限制异党活动条例》，公开制造什么“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什么“共产党捣乱”、“不听指挥”、“八路军游而不击”等等谬论。这股反共反人民的恶浪，很快波及到鄂西北，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我们分析，李宗仁一定会跟着蒋介石对我们下毒手。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在上级党的统一领导与安排下，对已经公开身份或暴露过多的党员，进行疏散。有的到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有的到延安；对尚未暴露身份而又比较精明强干的同志，由组织安排打入国民党举办的“青训队”；有的利用同乡、同学、族姓关系，安排到其他区开辟党的地下工作。我因为当时已把父母迁居均县菠萝岩居住，这里有几个老同学关系，可利用地方上层关系作掩护，组织上确定把我留在均县坚持党的地下工作。此时，我即离开草店文化站，到均县南区菠萝岩、浪河等地，和当地的同志一道，开辟武当山区的工作。在均县先后开辟和组建了南北两个区的党的地下工作，并利用合法形式，打入了几个乡政权，基本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依靠这几个乡村政权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传播革命火种，随时准备在武当山区、在汉江南北两岸建立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初，组织上就确定由我负责均县县委工作。根据当时的打算，准备以均县为中心，逐步开展鄂西北各县的工作。一九四一年元月，蒋介石发动了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这前后，反共的凶焰烧到了全国。国民党第五战区内的军、警、宪、特，以及国民党党部，都加紧了对共产党和抗日人民的残酷迫害。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的。据以后知道，先是襄、光、谷中心县委书记张书武被捕叛变，接着逮捕了当时均、郧、房中心县委书记邓一陶（当时单线领导我们，化名胡伟），不久自首，供出了一百余名共产党员的名字，并且载于第五战区在老河口出版的《阵中报》上。这样，整个鄂西北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形势十分严重。由于均县地下党在山区，而且掌握有武装力量，国民党还未直接对我们采取措施。我们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关系，我就多方想法寻找去解放区的门路。

（二）

湖北、河南地下党组织本来是互不发生关系的，后来，发现我们河北区党组织原来是河南浙川党组织发展后交给湖北的。即通过河北区委郭伊川及黄绍鲁（黄艺林）等同志的关系，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底五月初，在郭伊川家里与浙川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周尚杰见了面。经过交谈，我提出要到解放区去，找上级党组织。周说他与上级有联系，并讲了他的主张。他说：“日寇可能占领河南，应当留下来准备搞敌后游击战争。”我因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个人也无定见，就同意了他的意见。当时我们对时局有以下分析：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估计日本对蒋占区将从全面进攻转向用一段时间巩固其占领区，打通平汉线、粤汉线，然后集中力量对付我敌后根据地，对国民党采取军事上威胁压服，政治上引诱投降。从国民党消极抗战看，也可能准备投降，这必然引起抗日新高潮、引起敌后我抗日根据

地的新发展。同时还认为，敌人巩固其占领区也只是暂时的，因为蒋介石还未投降，可能日寇侵占开封、郑州后，很快就要进攻洛阳，进攻西安，从北面包围和进攻四川。或由武汉侵占襄阳、老河口，顺老白公路而上，占领汉中，配合进攻西安之敌南下。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决定不能到解放区去，应当留在当地工作，及早掌握地方武装，一旦日寇占领豫西，我们立即建立敌后抗日游击区。我们当时打算，可以依靠有社会地位的我地下党员，在日寇占领豫西以前起义，搞名义上的民主政府，在党的领导下，掌握区政权，如发展的快还可建立县里政权。如张玉杰，家庭富裕，有社会地位，又是联保主任，正适合以灰色面目进行工作。这样，日寇不占领，可以加强抗战；日寇占领后，更有利于发展抗日力量，如果成功不了，可以退到秦岭商洛一带打游击。当时淅川的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基础条件也好。一是淅川是大山区，西面是荆关、商洛，南面是郧县、均县，都是大山区，便于打游击，东面又是五师根据地（李先念部队）。二是淅川当时有比较多的地方武装，枪支多，有一些联保长是我们的人，其武装实际上都是为我们所控制。三是各种地方势力之间有矛盾。如陈重华、任小秃是我们反对的对象，李官桥的黄从书与陈、任有矛盾，还可利用陈、任与内乡等地恶霸的矛盾，民变中他们不一定干涉。同时这些土顽与国民党又有矛盾，国民党对他们又利用又害怕，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不能进入淅川。四是最根本的矛盾还是地主恶霸与农民的矛盾。当时豫西南整个是民不聊生，民变烽起，这是地主恶霸无法控制的。

我们认为可以干，于是就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当时有一

条界限：不必急于发难，必须等日寇占领豫西后再干。对此，我们做了如下准备：第一个是干部准备。加强对党员思想教育，训练一批干部，我们办了三次大型党员短训班。一次在上寺，一次在四峰山，一次在横山洼，每次八至十天，都有四、五十人参加。因周尚杰由延安回来，对形势比较了解，他讲抗战形势，我讲社会发展史。这期间通过周尚杰的介绍，我认识了马水平、姚长有等同志。第二个就是抓武装。把南山武装抓过来，如张玉杰、胡郅藩、左孔璋，还有黄从书，以及陈、任士顽的民团营长金宣周等。金有一营兵力驻在李官桥，其爱人腊希华是我地下党员，可以对金进行策反工作等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暴动的直接原因，就是在一九四一年农历九月底，区长宋精白派人残害了我地下党员姚炳连和进步人士梁自强等，紧接着又残害了我地下党员马青彦、马士彦，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气愤，也估计敌人可能要来个大搜查、大屠杀。我们当时非常年轻，缺乏斗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复仇心切，就决定立即同他们干！

于是，就借口派粮派款不公，要与宋精白算帐，通知各联队副于农历（一九四一年）十月初发起起义，围攻宋湾。群众对那些地霸、土顽残酷地重重压榨，逼得走投无路，早已恨之入骨，民情激愤，一触即发。有的群众听到要暴动，激动地说：“他妈的，干他一场！吃上一顿白米饭，死了也甘心情愿，也是痛快的！”起义的两个中队武装上山后，群众自动给送饭菜，大力支持，有的奋不顾身投入战斗。记得有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也拿起枪连续射击敌人，这场民变群众称之为“查衙门”。起义后，在宋湾坚持有三天时间，起

义的第一天，反动土顽陈重华、任泰升很快集中了几个中队的兵力，并将金宜周的一个营也调来打我们。他们是有组织的常备武装，我们都是贫农，无作战经验，又未经过训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硬坚持，不然将造成更大损失。争取对象金宜周一方面给咱们送信让我们快走，一方面又在实际上逼着我们快走。后因寡不敌众，节节逼退到南山。金宜周也未真正打我们，听得出枪是对天放的。黄从书因时间提前，未来得及通知他，当他得知宋湾已起事了，便带领队伍向宋湾挺进，不过这时已晚了，我们被打散了。黄也因孤军作战，又受内乡民团的后剿也被打散了。我们退到南山后，未找到马水平。这时周尚杰和我研究下步怎么办，周尚杰主张到赵川上秦岭打游击，我的意见可先到解放区请示上级，与解放区接上关系后，再逐步把失散了的同志收拢过来，带到解放区或建立游击区。周尚杰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便一起到玉皇顶郭伊川家住了七、八天，筹集了些路费，于十一月底化装出发，通过地下党联络站，由交通员带领于十二月底顺利到达了豫鄂解放区。到解放区后，我们提出要回来收拢已失散的同志，但因正处国民党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上级党讲，国民党到处捕人，谁变节谁未变节不知道，不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感到有道理，服从组织决定，所以就未再回来。此后我和周尚杰同志也分开了。

(三)

对于这次农民起义要有一个正确的估价，这样才能更好

地鼓舞革命人民斗志，更好地保持我们党、我们革命人民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并以大量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尽管这次暴动是错误的，但广大党员、广大人民和基层干部，他们英勇顽强斗争精神，是革命的正义行动，他们是负有责任的。这在民主革命时期要这样看，就是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地也要这样看。以利团结起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使大家就象当年英勇牺牲的那些人民，那些党员，那些干部一样来搞好今天的建设，努力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好。

浙川人民在刘、邓大军南下，以及解放伏牛山战斗中都是英勇的，在配合陕南根据地，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解放全中国都起了很好作用，做出了贡献。假若不是在这些斗争中，培养出来这种革命精神，这是不好理解的。所以有他们的功绩，有他的历史意义。但是，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工作，群众工作，群众斗争要进行总结，肯定正确的东西，并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是必要的。从整个情况看，浙川地下党当时这一段，党的工作是的，而且好多做法是对的。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的“三大法宝”，这个文件当时我们没有看到。他讲：中国在民主革命阶段有三大革命法宝。第一个法宝是武装斗争，第二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第三个法宝是党的建设。我看这三个方面都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从掌握武装来说，浙川人民武装比均县还多，在均县主要通过党领导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掌握了一些武装；在浙川一般家家户户都有枪，是“保甲”强迫农民都买枪，但是我们恰恰利用了这种形势，通过建党发展党员，教育党员，把这

些武装掌握在我们党手里。如当时的几个联队副，都是我们的党员，这些武装要在敌人真正占领后它就要发挥很大的作用。这种作法，我看当时是正确的，浙川南区当时是 每个乡、每个保，差不多的武装除开宋湾保本身以外，都掌握在我们手里。那里的群众工作也是好的，我虽是外地人，群众都愿意接近，你要什么情报，都可以为你提供。

从党的建设来说，我看当时路线也是对的，主要是吸收了广大贫下中农，还吸收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如胡鄧藩等，这很多都是小学教员，象刻字工人 张 继 存，我对他印象很深，后被敌人杀害。我们还吸收了上层一些人物，特别是他们的子弟，尽管他们家里是大老财、中老财、小老财。但是，他的儿子们、姑娘们我们吸收了不少对他们加强了教育工作。从以后的斗争实践中，证明了这些农民，这些贫苦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其他阶级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后顽强不屈，真正跟敌人跑的，叛变的是极少数。当然也不排除有投敌叛变或就是敌人派进来的。但从整体来讲，党的建设还是很好的。

从统一战线来说，有过这样一些形式。一是吸收有一定地位作掩护的人，请他们作联保主任、乡长。找在社会上有地位，能在县里说上话的人，搞上层政权，用这样的方法来掩护党的工作，掩护我们抓武装，这方面的人有的后来发展为党员。有的成为党的同情者。二是我们也派一些党员，争取上层人士，金宣周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这些做法，是应当肯定的，是符合党的要求的。

对照毛主席关于在国民党占领区应采取的方针，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活动不够隐蔽，过早的确定搞武装起义。当

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文件。毛主席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不是说不可以准备武装斗争的工作，也不是说不可以搞统一战线工作，而是我们在活动方式上，不应该大摇大摆地那样干，那样大的声势办了几期学习班，这等工作是太暴露了。所以引起敌人的注意和对我们的镇压。

从我们的工作重点来说，当时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山区，放在农村。我在均县就是这样，所以“皖南事变”后我们仍能站得住，因为敌人少了，他不敢进山，敌人多了，我早就逃之夭夭。在城市里就不行，会很快被敌人抓起来。

另外，就是进行沦陷后的武装斗争准备工作，我看是必要的，一旦沦陷我们就要起事，当然在没有沦陷，决不能搞武装起义。在没有沦陷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这种过早的暴动是错误的。就是沦陷了，敌人占领了，我们也要观察分析各阶级动态，分清哪是进步势力，哪是中间势力，弄清我们要打击的对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从游击战作起，经过锻炼然后领导起义，这是以后才有这种体会。

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的反抗和斗争精神是宝贵的。他们在打击敌人，无论是对地主恶霸的斗争，还是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只要是英勇不屈的，都是可歌可泣的。在这次暴动中牺牲的同志和起义失败后仍坚定不屈，有的被杀害，有的到外地隐蔽，受尽了千辛万苦，毫不屈服的同志，他们这种奋不顾身顽强斗争精神，应当受到我们的敬仰，烈士的英名，永垂不朽！

我是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十一月这段时间在浙川，前后大约五、六个月，因时间久了，很多情况记不清了，有些看法

如有不妥，请同志们指正。

本文作者黄正夏，系湖北省襄樊人。一九四〇年任地下党均县县委书记，一九四一年（农历民国三十年），参加领导我县宋湾农民暴动。现任我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

宋湾农民暴动

田永潮 张恒耀 阎振华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农历十月初一），在淅川县宋湾一带爆发了一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震动宛西数县的农民武装暴动，它在豫西南我党历史上，写下了英雄悲壮的一页。

（一）

宋湾，地处淅川老县城以南，与鄂西北的均县接壤，三面环山，北邻丹江河，土地贫脊，到处一片荒凉。这里虽是偏僻的山区，但解放前地方反动势力的统治较强，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其代表人物国民党宋湾区区长兼民团团团长宋精白就长期盘踞此地。他们建立了一支千余人的反动武装，持此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霸占土地，抢掠民财，强奸妇女，屠杀革命志士和无辜农民，使宋湾一带成了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人间地狱。当地群众提起他，无不恨之入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九三八年五月，共产党员周尚杰，现名尚友由延安抗大毕业，经河南省委和南阳中心县委派回淅川开辟工作。七月担任地下党淅川工委书记。他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的组织。到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反动派由消极抗日转向积极反共，淅川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周的活动开始受到反动派的严密监视。因此，在该年秋豫西南地委派地